

马哈迪政府对东海岸铁路项目决策研究 ——基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Mahathir Government's Decision Making on the East Coast Rail Link Project

石有为** 杨健斐*** 王昭晖****
(SHI Youwei) (YANG Jianfei) (WANG Zhaohui)

摘要

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后，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政府在对待东海岸铁路（以下简称东铁）项目的态度上出现了较大转折：从上任伊始雷厉风行地宣布暂停与审查，到后续重新与中国谈判，并最终达成新的协议使得项目复工。为什么马哈迪政府会先后采取暂停审查与谈判重启的政策？如何解释马哈迪政府对待东铁项目的决策转变？本文运用多元启发理论进行解释，认为马哈迪政府的两次东铁项目决策都是首先经由国内政治关键维度的认知筛选，然后对剩余方案进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文章有力回击了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实施债务陷阱和新殖民主义的批评，强调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及其决策自主性。同时，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给予马来西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东铁从暂停到复工很好地体现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本文对2018年大选后马哈迪政府两次东铁决策的深入分析也能够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提供重要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东海岸铁路、马哈迪、多元启发理论

Abstract

Following the Malaysian General Election in 2018, the Pakatan Harapan (PH) government, led by former prime minister Tun Mahathir Mohamad, the East Coast Rail Link (ECRL) project reached a turning point. Tun Mahathir initially announced the suspension and review of the project after taking office. However, he then sought to renegotiate with China and both nations finally reached a new agreement to resume the project. Why did the Mahathir administration made such policy choices on the ECRL

* 本文系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南亚海岛国家外交决策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的影响研究”（21CGJ015）成果。

** 石有为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邮地址：shiyouwei@stu.pku.edu.cn

*** 杨健斐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电邮地址：30220172201061@stu.xmu.edu.cn

**** 王昭晖博士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电邮地址：zhaohuiwang@xmu.edu.cn

proje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explain the Mahathir administration's shift in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he ECRL project. We argued that the Mahathir administration's policy decisions were initially filtered through the key dimensions of domestic politics before maximizing the utility of the remaining options. This paper strongly counters Western media's criticism of China's debt-trap and neo-colonialism objective us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whil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Malaysi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ts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At the same time, we argued that China sufficiently understood and respected Malaysia in the entire process. The suspension, negotiation, and resumption of the ECRL project well embodied the BRI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funded overseas projects.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ast Coast Rail Link, Mahathir, Poliheuristic Theory

前言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从《愿景与行动》所描绘的框架思路可以看出，东南亚海岛国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建设的首选区域。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海岛国家中的区域次大国及其自身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是海丝建设的头号合作对象国（薛力，2017）。

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执政期间（特别是第二个任期）通常被视为中马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九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马两国在2013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12年开始快速增长，从2012年的0.34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7年的16亿美元（ASEAN Secretariat, 2018）。在纳吉任下，马来西亚是最早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积极将本国的经济转型计划与海丝建设进行对接。2017年5月习近平会见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纳吉首相时称，马来西亚是共建“一带一路”早期收获最丰硕的国家之一，当前中马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侯丽军、关桂峰，2017）。

然而，中马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在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第14届全国大选（以下简称509大选）之后出现了明显调整。由马哈迪领导的反对联盟（希望联盟，以下简称希盟）以简单多数优势胜选，终结了以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为核心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以下简称国阵）长达61年的统治，实现了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首次政党轮替。马哈迪宣誓就职后，明确表示将重新审视所有中资项目，并且重新谈判任何“不平等条约”，以保证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Bland, 2018）。马哈迪于2018年8月陆续取消了两个由中国支持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分别为多元石化产品输送管道（Multi-Product Pipeline）和沙巴天然气输送管道

(Trans-Sabah Gas Pipeline)，并且对由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建）承建的东海岸铁路（East Coast Rail Link）项目进行重新审查和协商（Palma，2018）。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国际新闻媒体很快做出评论，认为马哈迪改变了前朝纳吉政府的“亲中”政策，转而采取“反中”或者说“敌对中国”的政策立场。例如，《金融时报》报道马哈迪在2018年8月访华时强调，“自由贸易也应当是公平贸易，我们不希望看到殖民主义的新版本（a new version of colonialism）”，以此说明马哈迪“敌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Hornby，2018）。《华盛顿邮报》则报道马中关系在马哈迪任下出现了“性质转变”（qualitative shift），马来西亚由一个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变成一个批评中国的国家，在新的双边关系中马哈迪坚持要求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经济协议（Heydarian，2018）。“亲中”和“反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是国际新闻媒体报道的惯常思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和反思就可以发现，这种“敌我逻辑”一方面忽视了马哈迪重审项目并非只针对中国，因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建的隆新高铁项目也被马哈迪推迟到两年之后，另一方面忽视了马哈迪的新政府出于国内执政合法性考虑对前朝政府的贪腐问题和“负资产”进行检讨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509大选后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调整是暂时的。2019年1月，马哈迪就东铁项目表示，只要中国愿意，马来西亚可以缩小规模继续进行建设（Su，2019）。3月，马哈迪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中明确指出，“如果被迫在当前中美竞争中作出选择，马来西亚不会选择一个‘不可预测的’美国，而是会选择在经济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因为中国在地缘上离马来西亚更近而且拥有巨大市场，马来西亚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益。”（Jaipragas，2019）4月24至28日，马哈迪再次访华，在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时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和“一带一路”倡议大加赞赏，不仅重启东铁和大马城（Bandar Malaysia）项目，而且签署了涉及棕榈油和榴莲贸易、士毛月希望城（Bandar Harapan）、大马人工智能园、宝腾汽车研发与扩建、可负担房屋建设等多项备忘录和协议，堪称成果斐然（傅聪聪，2019）。两位著名的马来西亚学者饶兆斌和郭清水甚至称马哈迪此次访华将带来马中关系的第四次突破（Ngeow & Kuik，2019）。

可以看出，509大选后的一年时间内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政府在对东铁项目的态度上出现了较大转折：从上任伊始雷厉风行地宣布“暂停”，表现出对中资项目的消极态度，到后续重新与中国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使得项目“复工”。为什么马哈迪会先后采取暂停审查与谈判重启的政策？如何解释马哈迪政府对待东铁项目的决策转变？虽然东铁搁置一度对“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但中国充分尊重对象国的决定以及中马最后通过协商方式妥善解决东马复工问题，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共商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典型案例之一。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有效地回击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实施“债务陷阱”的批评，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共建过程中所展现的决策自主性也令“新殖民主义”等标签不攻自破，这是本文试图对马哈迪的东铁决策进行深入研究，期望能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批判性述评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运用多元启发理论对509大选后马哈迪政府对东铁项目决策进行解释。下文阐述多元启发理论的分析框架，并说明该理论对于本研究的适用性，然后对马哈迪政府的两次东铁项目决策提供比较好（贴近

现实)的解释。本文认为,马哈迪的两次决策都是首先经由关键维度的认知筛选,然后对剩余方案进行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在第一次决策中,由于509大选动员和竞选的延续性,马哈迪政府首先排除遵照协议继续建设东铁的方案,保留暂停审查与毁约培养两个方案,然后综合权衡这两个方案的总效用水平,最终选择暂停审查方案。在第二次决策中,希盟面对反对党和民众的质疑和压力大大增加,马哈迪政府首先排除遵照协议和维持暂停方案,然后又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华关系等因素,最终选择与中国重新进行谈判并达成新的协议。本文对509大选后马哈迪政府两次东铁决策的深入分析能够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提供重要启示。

一、文献述评:马来西亚对外政策分析的理论视角之争

围绕马哈迪政府对东海岸铁路项目的两次决策,已有文献主要从体系层次、国内层次、个人层次的分析视角出发,通过小国的平衡外交、国内政权合法性、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等理论路径进行研究。

首先,体系层次的解释强调马来西亚作为一个中小国家,必须在中美之间实行对冲战略,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需要重新实现平衡外交,这是马哈迪政府暂停东铁的国际背景(孙西辉、金灿荣,2017; Kuik & Liew, 2018)。具体而言,对于大选后上台执政的马哈迪政府来说,马来西亚所面对的国际体系压力在于,它面对一个高度不确定性、更多地以国内利益优先、对外战略收缩的美国,同时又面对一个在国际经济治理、地区经济合作扮演越来越大角色的中国。而且,中美之间从2018年开始确定两国竞争常态化的状态,美国运用综合实力对中国全面施压,包括贸易、金融、高科技、领土主权等问题(Wang & Zeng, 2020)。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马来西亚的“等距离外交”或者说“两面下注”的对冲政策显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从体系层次的视角来看,马哈迪上台后的对外政策应被视为马来西亚同时疏远中国和美国,从“两面下注”过渡到“多面下注”的策略。例如,马哈迪公开批评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性,并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表示特朗普不可能赢得下次美国大选(Lee, 2018; 饶兆斌 2019: 204)。马哈迪转而加强同日本的关系,以对冲同时疏远美国和中国给马来西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2018年半年左右的时间内,马哈迪先后三次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超高待遇接待,被授予日本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并且获得了2000亿日元的“武士债券”以帮助马来西亚解决国内财政问题(Waikar, 2018)。事后来看,体系层次的解释可以部分解释马哈迪政府2018年暂停东铁的决策,但对于2019年重启东铁的解释似乎较为无力,因为中美竞争常态化作为常量,比较难以解释东铁决策改变这一变量。而且,如果没有打开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的黑箱,仍然无法很好地厘清体系压力对于东铁决策的影响机制,因此把解释的层次从体系层次下沉到单元层次,即国内和个人层次,有可能能够更好地解释马哈迪政府的东铁决策。

其次,国内层次的解释强调国内政权合法性对于马哈迪决策的重要性,马来西亚国内选举政治和族群政治成为影响马哈迪对华决策的关键因素。政治家的首要逻辑是政治生存(Mesquita et al, 2003),因此马哈迪作为反对党上台后的首要考虑是维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其东铁决策应首先视为509大选前选举动员和竞选策略的延续。具体

而言，马哈迪在选举前基于对“中国因素”的政治动员，通过将债务、贪腐、主权以及种族问题捆绑，削弱了纳吉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成功地分化了马来人选民；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政府上台之后，与纳吉政府的腐败问题做明确切割和进行彻查，并且实现竞选诺言，因此暂停并重新审查东铁项目（王昭晖、孙志强，2021）。然而，2019年希盟政府面对巫统和伊斯兰党在族群和宗教问题上的联合制衡，并且由于民生经济问题的解决陷入停顿，不得不把提高经济绩效作为其继续执政的最重要合法性来源，通过寻求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重启东铁作为选项之一），期望能够解决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避免族群和宗教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王昭晖、孙志强，2021）。一些学者虽不强调政治合法性问题，从“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路径更加细致地考察马来西亚国内行为主体、威胁体和听众之间的互动，对东铁的暂停与重启提供了完整的分析，但这本质上也仍是国内层次的解释（范若兰、龙泰格，2020）。综合来看，国内层次的解释可以较好地解释马哈迪政府暂停和重启东铁的决策，也可以比较清楚地厘清决策机制，但对于决策过程中利益（理性）和观念（认知）因素分别有何影响和如何影响，也许还可以再做更多的探索。

再次，个人层次的解释强调马哈迪个人的观念和认知对于东铁决策的影响。在个人化和小集团决策模式中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尤为重要，因此马来西亚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有限参与的特征使得马哈迪个人的观念和认知在东铁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傅聪聪，2019）。例如，马哈迪长期以来不仅亲近日本，而且一直把日本当做学习的对象，他的“向东学习”也就是“向日本学习”（马哈迪，2018），结合马哈迪个人的观念和认知可以更好地补充从体系层次出发对于马哈迪同时疏远中美而转向日本的解释。然而，这一解释和体系层次解释同样无法很好地解释马哈迪重启东铁的决策，因为已有研究对于2019年马哈迪观念和认知的变化语焉不详，而且这一分析也常常有“特设”（ad hoc）或者“事后归因”（post hoc）之嫌。

最后，还应该简要探讨一下决策中的有限理性问题。不管是体系层次还是国内层次的假设，都暗含行为体完全理性（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的假设，即人的推理和计算能力足够高，以至于在面临问题的时候，不仅可以清晰地界定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而且可以在所有的解决方案里挑选出最优的方案（王鸣鸣2008：57），因而东铁决策就是马哈迪在综合考虑内政外交和各种政策选择后做出的最优决策。然而现实并不完全符合这一理论假设。例如，马哈迪领导的希盟作为反对党，在509大选前和上台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信息不完全的，马哈迪作为关键决策者也并非完全理性，其决策过程受到个人观念和认知的影响，其决策结果也有可能仅是满足而非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况且，在马来西亚多元政治格局中，个人利益、族群利益、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都不完全一致，因此完全理性模型的解释力会受到诸多质疑。实际上，马哈迪政府进行东铁决策时，必然要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与经济等多个角度来考虑，也必然需要考虑领导人的有限认知与有限理性对于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多元启发理论，正是期望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不仅对国际层次、国内层次、个人层次进行融合，而且对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理论进行融合，从而更好更完整地解释马哈迪政府的两次东铁决策。

二、多元启发理论及其适用性

（一）“多元启发”的含义

“多元启发”（poliheuristic）是一个复合词，由其前缀“poly-”和“heuristic”共同组成。其中，前缀“poly-”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指“多元”，与“many”同义，另一方面，它暗示“政治领导人根据政治维度的表现来衡量得失”；“heuristic”一词则是源于心理学，与“shortcut”一词一样具有“捷径”的含义，此处指“决策者用来简化复杂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认知机制”（Mintz, 2004）。

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研究不断发展的产物，多元启发理论是对认知心理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大胆融合。此前对外政策分析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决策结果两个方面，同时这两类研究所运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有关决策制定过程的研究一般采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认知理论方法，力图在国家内部探究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强调决策中的一切环境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认知的“过滤”才会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等认知倾向会导致其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并根据观察的“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张清敏 2003：39）。与之相反，有关决策结果的研究普遍采用理性主义方法，关注最后的决策“为什么”被制定出来，强调外交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假定政府或国家领导人在决策时会系统分析各种可能的政策方案，综合各种环境因素，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做出最优决策。在理性主义的分析方法中，代表不同国家的决策者像台球一样相互作用，对决策过程的控制和决策环境成为决定对外政策的关键（王鸣鸣，2003）。

上述两种研究思路分别关注了决策者的认知倾向和理性思维这两个特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长期以来，以上提及的两种研究方法互相竞争，难以克服各自的局限性，上文中的文献述评也展现了它们在对外政策实证研究上各有不足。多元启发理论综合了认知心理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首先使用认知启发，有效减轻认知负担，然后搭配理性计算，使得决策的效率更能进一步提升（肖晞、王琳，2017）。多元启发理论涵盖了对外政策制定的内容和过程，从而较好地弥补了认知心理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二者单独存在的缺陷。

（二）多元启发理论视角下的两阶段决策过程

由于综合了认知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多元启发理论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将决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而回答了决策的“原因”（why）和“方法”（how），即“为何做出决策”和“如何做出决策”的问题，将决策的过程和结果自洽地联系了起来（Redd 2002：336）。在多元启发理论中，决策的两个阶段分别是决策者们先通过认知捷径剔除一部分选项，对决策问题进行简化，再通过理性分析来对剩余选项评估，得到最终的决策结果。

具体来说，在第一阶段，决策者的行为更多体现了自身的认知倾向，即采取某些简化决策过程的“认知捷径”（cognitive shortcuts）。这些认知捷径表现为决策者遵循“非补偿性原则”（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和“非整体性”（nonholistic）原则，排除不能满足关键维度上效用要求的决策方案，从而缩减了可供选择方案的数量，节省了

寻求决策时所需的精力和时间，实现了决策过程的简化（Mintz 2004： 3-4）。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关键维度一般是国内政治维度，即政权的延续性和统治的合法性等。在这一阶段中，“非补偿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意味着决策者的选择是“基于维度”（dimension-based）而非“基于方案”（alternative-based）。（Mintz 2004： 7-8）决策者并非会在所有维度上花费同样时间和精力进行评估，而是首先认定某些维度属于关键维度，然后比较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否能够满足这些关键维度的效用要求（Redd 2002： 338）。因此，决策者总会在第一阶段首先排除那些有损于自己国内政治利益的方案。因此，不管某一决策方案的总体效用水平有多高，只要其在“国内政治”等关键维度上的效用无法满足要求（例如会影响到决策者执政的延续性和合法性），就会被立即排除在考虑之列。

在第二阶段，决策者的行为更加符合理性选择理论，在所有的维度上评估有关方案的效用，即从“基于维度”的决策过程转向“基于方案”的决策过程。在这一阶段，决策者遵循的是“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原则和“词典编纂”（lexicographic）原则（Mintz, 2005）。预期效用原则是指决策者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计算每个方案的叠加预期净效用；而词典编纂式原则需要决策者在一系列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效用最大的方案，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韩召颖、袁维杰，2007）。因此，经过第一阶段的筛选和第二阶段的评估，决策者最终得到的方案将是会在所有能够满足关键维度要求的方案中预期净效用最大的方案。这样的选择是在有限范围内而不是在全部范围内寻求效用的最大化，这也意味着决策者最终选择的并非是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方案，而是令决策者“满意”（satisfying）的结果。

下面以模拟案例具体说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下的两阶段决策过程。假设最初可供决策者选择的方案共有四个，分别以A、B、C、D表明；并且各个方案的效用水平表现在三个维度上，分别是国内政治维度、外交维度和经济维度。各个方案在不同维度上的效用水平可参照表1。对于决策者而言，政权的延续性和合法性等国内政治因素关乎其执政地位，故假设国内政治维度属于“关键维度”，其最低要求为30。

表1：决策模拟案例

方案	国内政治维度（关键维度）	外交维度	经济维度	总效用水平
A	50	10	20	80
B	20	50	50	120
C	35	30	35	100
D	10	30	70	110

根据多元启发理论，在第一阶段，决策者会基于关键维度（国内政治维度）对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筛选。其中，由于此前假设决策者对于国内政治维度的最低效用水平为30，尽管方案B和方案D总效用水平较高，但由于不能满足国内政治维度的要求，因此难以进入决策的第二阶段；相反，方案A与方案C由于满足要求，得以保留进入第二阶段。面对方案A和方案C，决策者在第二阶段的决策过程类似于传统的理性选

择过程，选择效用水平最大化选项，即方案C，方案A由于总效用水平较低，被决策者排除。图1展示了多元启发理论视角下的决策过程和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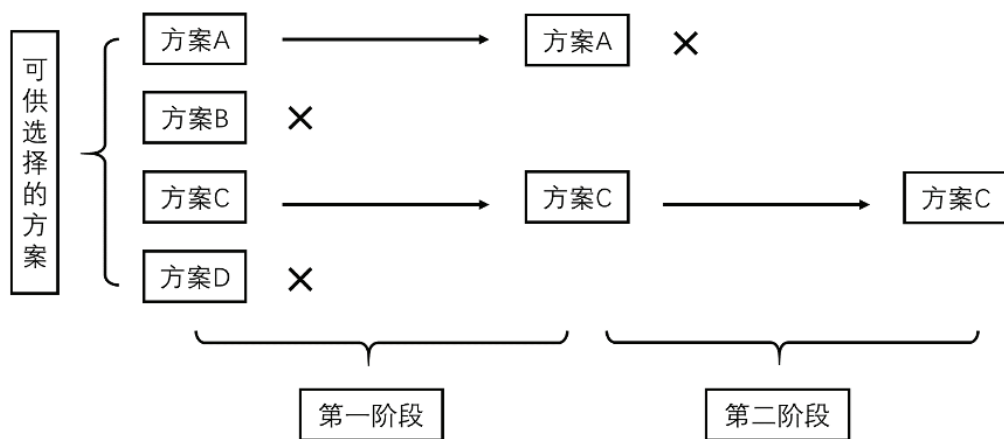


图1：多元启发理论视角下的两阶段决策示意图

数据来源：笔者自制

（三）多元启发理论对本文案例研究的适用性

经过长期的发展，多元启发理论在对外政策（包括安全和经济）制定、国内政策（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制定以及其他多种决策领域都表现出了相当的适用性。综合多个案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应对短期、与国内政治相关性较强的政策决策时，多元启发理论往往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陈冲、刘丰，2011；庄宏韬、曾向红，2015；韩召颖、赵倩，2017）。

首先，多元启发理论对于分析短期、突发性的决策具有明显的优势。通常来说，此类决策留给决策者的时间短，包含的信息相对复杂，决策者往往面临着时间和信息不足的问题，难以进行符合完全理性假设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启发理论中的“认知捷径”实现了决策研究过程的简化，能够更好地对现实进行解释（DeRouen Jr. & Sprecher 2004：58）。

其次，多元启发理论在分析与国内政治联系更紧密的问题时解释力更强。倘若某一决策问题并不涉及国内政治领域或者与国内政治的关联性较低，有关决策者执政的政治维度也就不会体现为“关键维度”。面对关乎政治生存的决策，比如涉及执政合法性、政权稳定等问题，决策者基于国内政治维度排除一部分方案的做法就更加符合实际（Oppermann 2014：37-38）。

从这两方面来看，用多元启发理论解释509大选后马哈迪政府对东铁项目决策具有特别的优势。从引言可以看出，从“暂停”到“重启”，马哈迪政府的两次东铁决策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从509大选后政权交接到7月4日喊停东铁项目，中间仅有不足两个月时间。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马哈迪政府对待东铁项目的态度又发生较大转折，一直到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几天才最终做出重启的决

定。而且，从上文中的文献述评中可以看出，两次决策也都与马哈迪政府的合法性有明显联系。“中国因素”在509大选前后皆与马来西亚国内选举政治和族群政治交织，东铁也引起了国内执政党、在野党、新闻媒体、选民等政治行为体的广泛关注，这使得影响马哈迪政府东铁决策的因素绝不仅仅局限在对外政策或者国内经济政策领域，而是与国内政治紧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启发理论对马哈迪政府的东铁决策分析有更好的适用性。

三、马哈迪政府暂停东铁决策分析（2018年509大选后—2018年底）

（一）可供马哈迪政府选择的方案

509大选后，马哈迪政府围绕东铁项目可以选择的决策方案包括：遵守此前与中国签订的合作协议，继续推进项目建设；暂停项目建设，对具体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全面取消此前签订的合作协议，并支付相应的赔偿。由于暂停东铁的决策与509大选前中马关系的发展和马哈迪的竞选策略紧密相关，下面结合纳吉任期内中马关系的发展以及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考量三个方案的效用水平。

如引言所提到的，中马关系在纳吉执政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马来西亚与纳吉举行会谈，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两国在吉隆坡发布了中马关系史上第四份《联合声明》，提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纳吉在其任内第三次正式出访中国，达成东铁项目的合作意愿，并承诺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落实，争取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2017年纳吉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充分表明了马来西亚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

除政治与外交方面外，纳吉在任时期，中马两国的经贸往来也日趋密切。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16年被越南超过之前，马来西亚也一直是中国在东盟内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贸易总额自2013年起就超过1000亿美元，此后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此外，中国游客赴马来西亚的旅游活动也日趋频繁，马来西亚从中国游客消费中取得的旅游收入也不断增加，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开始在马来西亚申请“第二家园”居留证。

然而，伴随着中马之间日趋紧密的外交关系和经贸联系，一些隐患和争议也逐渐产生。例如，中国广核集团于2015年收购一马公司（1MDB）旗下部分资产，解救了该公司此前所处的财务困境，但随着纳吉和一马公司爆出贪腐丑闻，中国在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逐渐在某些政党和媒体的宣传活动下成为一项“政治化”的议题，引发了马来西亚全国各界的讨论。正是在2016年前后，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增加（参见图2），一跃成为马来西亚制造业、房地产领域的最大境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尽管从总量来看，马来西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还是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但是中资规模在两三年内的迅速扩大，让马来西亚国内民众产生一种“中资无处不在”的感觉（饶兆斌 2019：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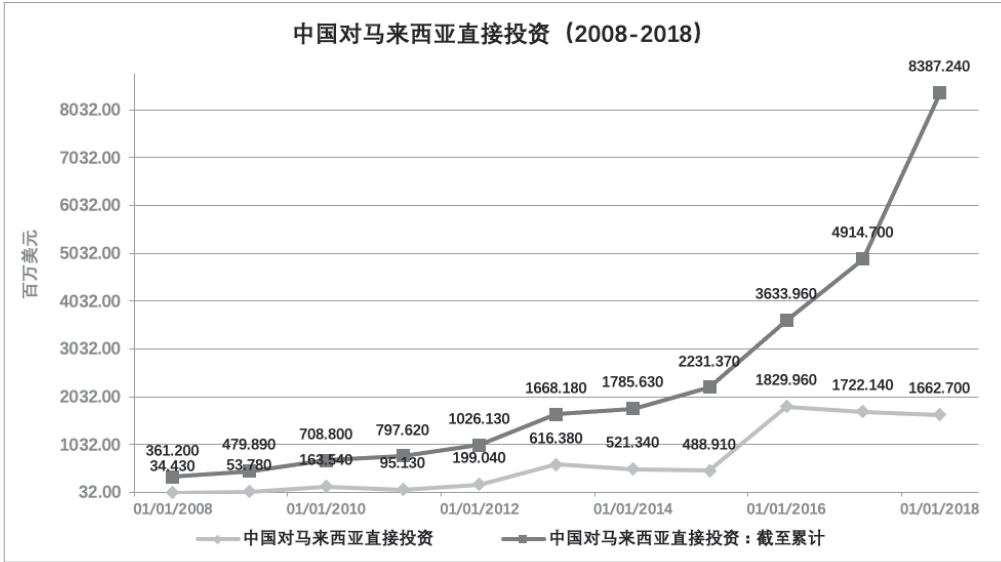


图2：中国对马来西亚直接投资（2008-2018）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鉴于马哈迪领导的希盟在509大选期间将选举动员的重点放在纳吉和一马公司的贪腐丑闻等问题上，东铁项目作为潜在的相关议题自然会进入到公众舆论和政治宣传之中。因此，以上三个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对于借助此种竞选策略当选的马哈迪政府来说在不同维度上有不同的效用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给各个方案各个维度效用水平的赋值属于排序性赋值，重点强调某一维度下各个方案的效用顺序，并非表示效应水平的绝对值。

首先，方案一实际上完全延续了纳吉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没有做出任何改变，不免引发国内的诸多争议。鉴于此前竞选时的宣传策略，马哈迪政府如果不与纳吉政府做切割，继续选择这一方案无形中也会使自己成为“出卖国家利益”、“涉嫌利益输送”等竞选口号的攻击对象，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众舆论的重大压力，影响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因此这一方案在国内政治维度的效用水平为最低（赋值-1）。另一方面，这一方案虽然在国内政治维度上不占优势，但是却能够比较好地维系中马外交关系和经贸联系，东铁建设在中长期来看也有利于平衡国内发展、有助于提振国家经济，因此这一方案在外交维度和经济维度的效用水平都为最高（赋值1）。

其次，方案三作为方案一的另一极端，完全否定纳吉政府对待东铁项目的支持态度，符合此前自己竞选时期所提出的种种承诺，最能够满足国内政治维度的需求（赋值1）。然而，这一方案会导致中马关系的迅速恶化，短期内不仅要付出巨额违约金，中长期来看亦不利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因此这一方案在外交维度和经济维度的效用水平都为最低（赋值-1）。

最后，方案二相较于方案一和三，恰好处于“折中”的位置。一方面能够满足国内对于彻查前政府贪腐问题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并不完全否定中国在马的投资项目，能够留有较大的余地在今后同中国方面进行磋商和谈判。因此，此方案在三个维度上的效用水平平均介于方案一和三之间，但由于暂停项目所带来的时间资金成本以及后续谈判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经济维度上赋值为 $[-1, 1]$ 这一区间，-1表示谈判彻底破裂最后导致项目取消，1表示谈判成功并在缩减成本的基础上重启东铁项目。

综上，我们可以给三个方案在三个维度上的效用水平赋值如下表2所示。

表2：509大选后马哈迪政府东铁决策诸方案效用水平分析

方案	国内政治维度	外交维度	经济维度
方案一：遵守协议	-1	1	1
方案二：暂停项目	0	0	$[-1, 1]$
方案三：取消协议	1	-1	-1

（二）第一阶段的选择：国内政治维度的优先性

多元启发理论假定领导人在第一阶段会基于某些“关键维度”对各个方案进行评估、筛选，首先排除在此维度上不能满足要求的方案。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这些关键维度一般是国内政治维度，其最低标准是保证领导人继续掌握权力，即自身政权的延续性和统治的合法性等，只有当决策者所关注的国内政治维度这一关键维度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或者外交等其他维度（Kinne, 2005）。

对于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政府而言，国内政治当然是东铁项目决策上的关键维度。如上文所述，509大选前，希盟作为在野的反对党，基于对“中国因素”的政治动员，将东铁项目、纳吉贪腐与国家主权等议题联系，削弱了国阵的执政合法性，并且通过对森林城市的批评、制造华人威胁的手段赢得马来人选票，成功分流了国阵的马来人票源，最终赢得了509大选；509大选后，希盟政府为了获得执政合法性，需要与前政府的贪腐问题做切割，并且继续争取马来人的支持，这使得国内政治维度成为决策的首要考虑。方案一明显难以满足这一关键维度的最低要求，因此在这一阶段的认知选择中被淘汰出局，方案二和方案三得以进入第二阶段的理性选择过程。

（三）第二阶段的选择：剩余方案的理性评估

第二阶段中，决策者对剩余的方案进行理性选择，即马哈迪需要从剩余的方案二与方案三中选择总体效用水平最大的一个，这需要对两个方案在外交维度和经济维度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考察。

对比方案二与方案三，暂停审查相较于否定毁约显然更能给予中国方面必要的尊重。东铁项目是马来西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目前在海外投资、承建的最大项目，对两国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东铁项目被直接否定，将被视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遇到的重大挫折，不仅会使中马关系走向低谷，甚至可能影响未来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外交策略。方案二虽然会使中交建在短时间内停止建设，但是审查并不意味着对于项目的全盘否定，中马双方仍然有继续谈判、

付相应的赔偿。下面结合希盟上台以来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以及民意状况，考察四个方案的效用水平。

如前所述，509大选中希盟、巫统和伊斯兰党三分马来人选票的局面意味着，争取马来人选票的族群政治仍将是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的最重要议题之一；509大选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最为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巫统与伊斯兰党从对立走向合作，不断制造马来人对希盟政府的紧张情绪，希盟政府则必须应对在野的巫伊联盟所共同施加的政治压力。具体来说，伊尔哈姆中心（Ilham Centre）与槟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的联合民调充分显示了在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合作动员下马来人对希盟政府的不满与不安。这份联合民调在全国范围内面访了2,614位马来人，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Mahavera, 2019）。将近六成马来人对希盟政府的表现表示不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来人对希盟政府的认可基本只在打击贪腐加强廉政方面（64.2%），而对于希盟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和关注“马来人议程”方面尤其不满，其中54.4%的马来人认为希盟政府忽视马来人权利和伊斯兰利益，62.9%的马来人担忧非穆斯林已控制联邦政府，62%的马来人则认为民主行动党主导希盟政府决策。

表3：马来人对希盟政府的看法

	同意（%）	不同意（%）
对希盟政府的表现满意	40.8	<u>59.5</u>
希盟政府忽视马来人权利和伊斯兰利益	<u>54.4</u>	45.1
希盟政府严肃履行竞选承诺	49.8	50.1
希盟政府打击贪腐加强廉政	<u>64.2</u>	35.7
希盟政府试图颠覆马来人统治者	46.8	53.2
联邦政府认真解决民生问题	41.7	58.3
非穆斯林已控制联邦政府	<u>62.9</u>	37.2
民主行动党主导希盟政府决策	62	38
希盟执政国家没有未来	45.6	54.4
希盟政府只能执政一届	47.7	52.3
马哈迪应该完成五年任期	47.4	53.6
安华是首相的最合适继任者	51.9	48.1

资料来源：伊尔哈姆中心（Ilham Centre）与槟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的联合民调，转引自*The Malaysian Insight*（2019年1月31日）。

比马来人的不安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民生经济问题的解决陷入停顿，希盟政府遭遇的质疑并不单纯来自于马来人群体，而是已经扩大到全体马来西亚民众。根据默迪卡中心在2019年3月的全国民意普查，有58%的马来人认为通货膨胀是他们的首要关切，有23%的马来人认为工作机会是他们的首要关切；当然这一数值在穆斯林土著中更为显著，有69%的穆斯林土著马来人（Muslim bumiputera）认为通货膨胀是他们的首要关切，有29%的穆斯林土著马来人认为工作机会是他们的首要关切（Merdeka Center, 2019）。默迪卡中心的全国民意调查还显示，马来西亚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满意程度

从509大选后的79%一路下跌到2019年3月的39%（图4），对于联邦政府管理经济的不满程度从509大选后的12%一路攀升到2019年3月的52%（图5），对首相的支持率也相应地从509大选后的83%下降到2019年3月的46%（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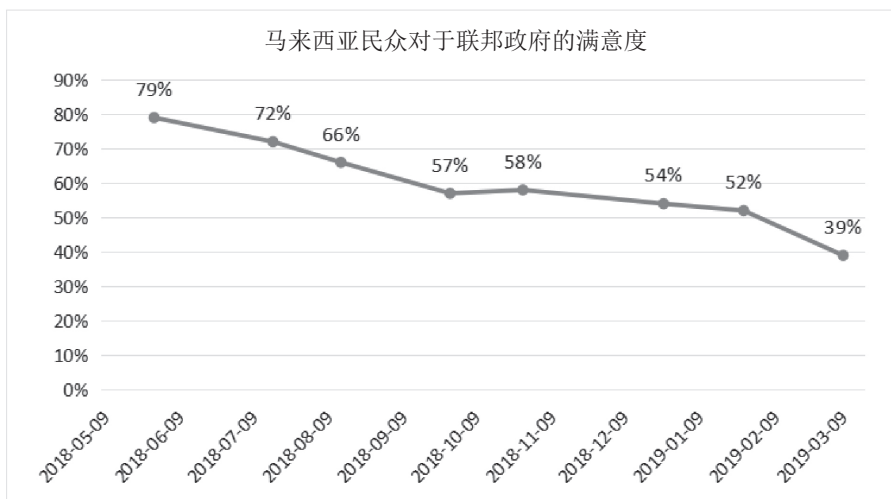


图4：马来西亚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的满意度

来源：笔者根据 Merdeka Center's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urvey (11 March 2019) 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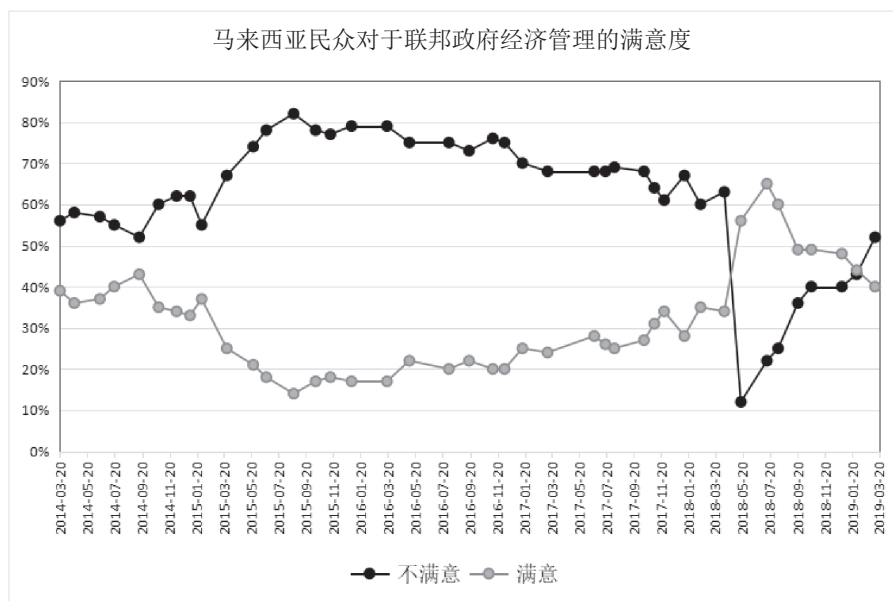


图5：马来西亚民众对于联邦政府经济管理的满意度

来源：笔者根据 Merdeka Center's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urvey (11 March 2019) 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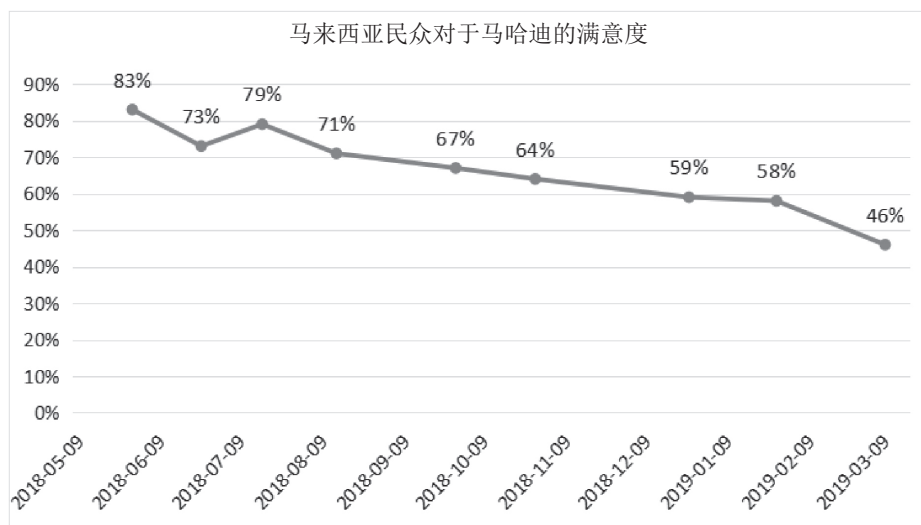


图6：马来西亚民众对于马哈迪的满意度

来源：笔者根据 Merdeka Center's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urvey (11 March 2019) 绘制

因此，希盟在2019年所面对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意状况是“若马来西亚经济持续低迷，身份认同政治，尤其是族群与宗教的矛盾就会被挑起”（林宏祥 2019：112），相较于509大选后在2019年希盟所面对的来自于反对党和民众的质疑和压力大大地增加了。因此希盟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振兴陷入困境的经济，避免在族群与宗教议题上与巫伊两党对垒，从而保证执政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盟政府在2019年关于东铁项目的四个决策方案中，经济维度的效用水平可以赋予更大的数值，因为国内经济发展对于希盟政府相当重要。

此次决策的方案一和第一次东铁决策中的方案一类似，但这一决策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中马关系的发展，表示马来西亚对于“一带一路”的坚定支持，因此外交维度上效用水平最高（赋值2），国内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保持不变，分别赋值-1和1。

此次决策的方案三和第一次东铁决策中的方案二类似，但维持暂停对于希盟政府提振国内经济已经基本无用，因此在经济维度上赋值为0。实际上，方案三作为基准方案，在三个维度上的效用水平均赋值为0，可以很好地与其他方案做比较。

此次决策的方案四比第一次东铁决策中的方案三类似，不仅要支付大量的违约金，而且也令希盟政府在2019年的关键时刻彻底丧失了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振兴国内经济的机会，因此在经济维度上效用水平最低（赋值-2），国内政治维度和外交维度也保持不变，分别赋值1和-1。

此次决策的方案二最为复杂，因为涉及到中马东铁谈判的不确定性问题。倘若中国政府能够接受马来西亚提出的修约条件，能够帮助马哈迪政府摆脱巨额赔偿和高昂造价之间的两难困境，减轻财政预算和国民经济的负担，并且在维护中马友好关系的同时兑现此前的竞选承诺，这种情况可谓一举多得，此时国内政治维度的效用为1，经济

维度效用为2。倘若中马东铁谈判破裂，最后马哈迪不得不如方案四取消协议，此时国内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的效用分别为0和-1。

综上，我们给四个方案在三个维度上的效用水平赋值如下表4所示。

表4：2019年马哈迪政府东铁决策诸方案效用水平分析

方案	国内政治维度	外交维度	经济维度
方案一：遵守协议	-1	2	1
方案二：谈判修约	[0, 1]	1	[-1, 2]
方案三：维持暂停	0	0	0
方案四：取消协议	1	-1	-2

（二）第一阶段的选择：国内政治维度的优先性

这一阶段，国内政治维度对于各方案依然具有筛选作用。对马哈迪政府而言，国内政治维度直接表现为巩固希望联盟的执政地位。在上述国内民意（特别是马来人）支持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东铁项目对马哈迪政府在国内政治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马哈迪政府对东铁项目的消极态度会影响沿线马来族裔的支持。东铁项目经过了3个马来人密集州，即彭亨州、丁加奴州和吉兰丹州，东铁的建设和完工会带动沿线地区的产业发展，提升马来人对希盟政府的支持率，部分缓解希盟受到巫统与伊斯兰党联合夹击的困境。而且，如果马哈迪政府不能满足马来人发展经济、提升民生的诉求，下一届大选极有可能失去509大选中的马来人选票。

其次，东铁沿线地方政府对东铁因暂停审查造成的停工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使得马哈迪政府必须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作为实行联邦制的国家，虽然马来西亚各州政府也有一定的权力，但大部分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尤其20世纪7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联邦进一步收紧财政大权，地方政府无权自行支配税收，只能依靠售卖土地等换取资源。近年来，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地方经济利益的扩张，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愈来愈明显。例如，在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额方面，联邦政府所占比重大达 88%（其他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约占50%），给地方政府留下的支配空间很少，导致各州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严重不足。如果长期搁置东铁，会进一步加剧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张力：因为东铁首期工程已经开工，州政府在土地、运输和物资等方面已做出相应规划，不仅前期付出的成本难以收回，而且长期搁置令地方政府难以做出及时调整和止血。

因此，对于牵涉到沿线马来选民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东铁项目，马哈迪政府无法长期维持东铁项目暂停状态，更无法留待下一任政府解决，方案三显然无法满足第一阶段选择中国内政治维度的最低标准。方案一和509大选后决策时的情况较为类似，也在这一阶段的认知选择中被淘汰出局，方案二和方案四得以进入第二阶段的理性选择过程。

（三）第二阶段的选择：剩余方案的理性评估

进入第二阶段，马哈迪需要在方案二和方案四中进行综合考虑、权衡取舍，选择总体效用水平最大的方案，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两个方案在外交维度和经济维度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考察。一方面，方案四会令马来西亚完全丧失利用东铁项目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并且在支付中国大量赔偿金之外，恶化双边关系，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企业在马投资和双边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对于方案二，重启东铁固然取决于中马之间的谈判和磋商，但至少两国关系不会直接恶化，降低政府财政赤字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也有更大的可能性。而且，考虑到东铁项目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邻近，马方和中方都更有可能在谈判中相互做出妥协，尽快解决有关争议，从而恢复东铁项目的建设。因此，方案二相较于方案四，无疑是更有利于马哈迪政府的选择。

综上所述，在第一阶段因国内政治维度的重要性排除了方案一和方案三后，马哈迪政府综合权衡方案二和四，方案二虽具有不确定性，但其总效用区间的最低水平仍高于方案四的总效用水平。而且，方案二如果成功，既能避免违背此前的竞选承诺，又能在缩减成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留东铁项目，争取沿线马来族选民支持，缓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紧张关系，也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马哈迪政府会积极与中国磋商和谈判努力。所以，马哈迪政府最终选择了方案二，与中国重新进行谈判以修改相应的协议内容（参见图7）。根据双方协商谈判的进程以及事后双方公布的协议来看，马哈迪选择方案二的做法也的确实现了预期目标，即在巩固国内政权的前提下，使马来西亚的利益最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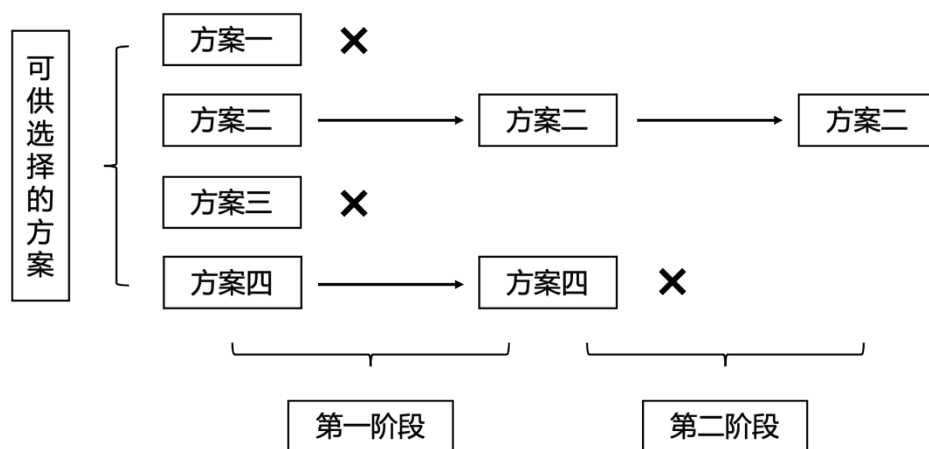


图7：马哈迪政府重启东铁决策分析（2019年初-2019年5月）

数据来源：笔者自制

结语

本文以马来西亚东铁项目为个案，对2018年马来西亚政治变天后马哈迪政府对东海岸铁路项目决策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采用多元启发理论视角提供解释，强调领导人的两阶段决策过程，只有在满足第一阶段国内政治关键维度的认识筛选后，才进行第二阶段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本文分别对马哈迪政府暂停和重启东铁两次决策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好地验证了多元启发理论的解释力。

本文研究表明，马哈迪决策的核心是第一阶段对于国内政治维度这一关键维度的考察与筛选。对于政治领导人而言，经济发展、外交关系这些维度固然重要，但是常常在政治生存面前需退居其次，即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与延续性成为决策的首要目标。因此，决策者有时看似做出“非理性行为”，其实并非是出于纯粹的敌意，而是应对国内民众或者部分利益集团诉求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如本文分析所示，在东铁项目问题上，给马哈迪草率地贴上“反中”的标签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西方媒体说大肆宣扬的“新殖民主义”和“债务陷阱”也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相反，509大选后东铁从暂停到复工的一年时间内，中国给予马来西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从行动上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促进了区域共同发展和繁荣。马国外长塞夫丁在东铁复工后表示：“马中可以克服障碍重启东海岸铁路项目，说明双方相互理解，且对彼此有充分的信心和信任。马中关系牢固，未来只会越来越牢固。”（游润恬，2019）

本文虽然做的是个案研究，但东铁项目作为“一带一路”的典型项目，也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一个缩影，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和海外投资具有重要启示。首先，马哈迪政府对东海岸铁路项目决策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国家自主性（agency），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多关注和尊重东道国国内政治社会，特别是“一带一路”合作以及中国海外投资短期内需要更多地关注政治转型后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中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牵头、国企投资的重大项目，在东道国国内选举政治中更容易被反对党精英“政治化”，因此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尤其需要提升风险分析和管控能力，才有可能保证“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应对东道国国内政治社会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有赖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合作规则上的协调与确定，通过规则制定来系统性地预防和化解风险。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主要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地区合作模式，其突出的特征是发展导向，但并不意味着排斥构建规则。双边发展战略对接、多边自由贸易保障体系和投资保护体系正在尝试推进，规则导向日趋明显，未来新型地区与国际合作规则的协商与确定必不可少（门洪华，2018）。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需要建立某种合适的规则机制，使双方共识制度化、法律化，在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的合作体制中结成伙伴关系，确保双方利益不受损害，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 ASEAN Secretariat 2018.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8*. Jakarta: The ASEAN Secretariat.
- Bland, Ben 2018. China's south-east Asia push threatened by new Malaysia regime, *Financial Times*, 15 May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94906ad4-57eb-11e8-bdb7-f6677d2e1ce8>
- DeRouen Jr., Karl & Sprecher, Christopher 2004. Initial crisis reaction and poliheuristic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1), 56-68.
- Heydarian, Richard Javad 2018. Malaysia's bold play against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14 November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worldpost/wp/2018/11/14/malaysia/?noredirect=on&utm_term=.8dd22e179e5b
- Hornby, Lucy 2018. Mahathir Mohamad warns against 'new colonialism' during China visit, *Financial Times*, 20 August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7566599e-a443-11e8-8ecf-a7ae1beff35b>
- Jaipragas, Bhavan 2019. 'Chinese by nature are very good businesspeople':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ohamad's exclusive interview in fu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March 2019.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2189225/chinese-nature-are-very-good-businesspeople-malaysian-prime>
- Kinne, Brandon J. 2005. Decision making in autocratic regime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6(1), 114-128.
- Kuik, Cheng-Chwee & Liew, Chin Tong 2018. Decoding the Mahathir Doctrine, Lowy Institute, 20 August 2018.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decoding-mahathir-doctrine>
- Lee, Yen Nee 2018. I'll be 'surprised' if Trump is re-elected: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CNBC, 12 November 2018. <https://www.cnbc.com/2018/11/13/malaysia-prime-minister-mahathir-on-trump-re-election-trade-war.html>
- Mahavera, Sheridan 2019. Majority of Malays unhappy with Pakatan but have hope, *The Malaysian Insight*, 31 January 2019. <https://www.themalaysianinsight.com/s/129735>
- Merdeka Center 2019. *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urvey*, 11 March 2019. <http://merdeka.org/v4/index.php/downloads/category/2-researches?download=192:national-march-2019-excerpt-for-press-release>
- Mesquita, Bruce Bueno de,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 James D. Morrow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IT Press.
- Mintz, Alex 2004. 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1), 3-13.
- Mintz, Alex 2005. Applied decision analysis: Utilizing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explain and predict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6(1), 94-98.
- Ngeow, Chow Bing & Kuik, Cheng-Chwee 2019. 4th breakthrough in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New Straits Times*, 24 April 2019. <https://www.nst.com.my/opinion/columnists/2019/04/482714/4th-breakthrough-malaysia-china-relations>
- Oppermann, Kai 2014. Delineating the scope conditions of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The noncompensatory principle and the domestic salience of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0(1), 23-41.
- Palma, Stefania 2018. Malaysia cancels China-backed pipeline projects, *Financial Times*, 9 September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06a71510-b24a-11e8-99ca-68cf89602132>
- Redd, Steven B. 2002. The influence of advisers 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3), 335-364.
- Su, Dan 2019. Malaysia may resume ECRL project on smaller scale, *Xinhua*, 4 January 2019. <http://en.silkroad.news.cn/2019/0104/126746.shtml>

- Waikar, Prashant 2018. Mahathir renews Malaysia's love affair with Japan, *The Diplomat*, 24 November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1/mahathir-renews-malaysias-love-affair-with-japan>
- Wang, Zhaohui & Zeng, Jinghan 2020. From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strategic competition: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trade dispute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5(1), 49-69.
- 陈冲、刘丰, 2011, 〈多元启发决策理论与美国总统使用武力: 一种定量检验〉, 《国际展望》, 第5期, 页58-74。
- 范若兰、龙泰格, 2020, 〈中国海外投资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问题研究——以马来西亚“东铁”项目为例〉, 《南洋问题研究》, 第4期, 页62-76。
- 傅聪聪, 2019, 〈马哈迪再访华: 双边关系“巩固提质”〉, 《世界知识》, 第10期, 页34-35。
- 韩召颖、袁维杰, 2007, 〈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 《外交评论》, 第6期, 页75-83。
- 韩召颖、赵倩, 2017, 〈国际危机中的领导人决策行为分析——基于多元启发理论视角〉, 《国际政治科学》, 第2期, 页1-27。
- 侯丽军、关桂峰, 2017, 《习近平会见马来西亚总理纳吉》, 新华社, 5月13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3/c_1120967288.htm
- 林宏祥, 2019, 〈2018年大选后的马来政治: 旧已破, 新未立〉, 载潘永强主编《未巩固的民主: 马来西亚2018年选举》,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马哈迪, 2018, 《医生当家: 敦马哈迪医生回忆录》, 海滨出版有限公司。
- 门洪华, 2018, 〈“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思考〉,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7期, 页19-40。
- 饶兆斌, 2019, 〈第14届马来西亚大选中的中国因素〉, 载潘永强主编《未巩固的民主: 马来西亚2018年选举》,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孙西辉、金灿荣, 2017, 〈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马来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 《当代亚太》, 第2期, 页4-35。
- 王鸣鸣, 2003, 〈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 《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11期, 页14-19。
- 王鸣鸣, 2008, 《外交政策分析: 理论与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昭晖、孙志强, 2021, 〈政党更替、族群政治与马来西亚希盟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比较政治学研究》, 第1辑, 页217-244。
- 肖晞、王琳, 2017, 〈多元启发理论与对外政策决策研究〉, 《教学与研究》, 第5期, 页104-111。
- 薛力, 2017,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东南亚外交〉, 《世界知识》, 第21期, 页73。
- 游润恬, 2019, 〈马国外长: 东铁项目重启说明马中充分理解信任〉, 联合早报, 9月13日, <https://beltandroad.zaobao.com/beltandroad/news/story20190913-988745>
- 张清敏, 2003,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 理论与方法〉, 《国际论坛》, 第1期, 页39-45。
- 庄宏韬、曾向红, 2015, 〈多元启发理论视角下的萨科齐对利比亚空袭决策〉, 《国际论坛》, 第2期, 页13-19。